

# 秋天的守望

---

□ □ ©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这是我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选集，也是一个遥远的残梦与约定。

古往今来，文学曾经是多少人的青春梦想甚至人生奋斗的事业，被一些人视为走向人生成功的天梯。人们都熟悉曹操之子——后来成为魏文帝的曹丕在《典论》中的那句名言：“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所谓“文章”，大概指的是诗赋一类文字，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之主流，“诗言志，文以载道”，也是关乎文化人安身立命的大事。这些经典名言流传甚广，曾经被多少代人奉为圭臬，并为之顶礼膜拜。大凡坚守文学者行走之初都相信文学上关国家兴衰，下联个人成败。然而，历史上真正把文学做成“经国之大业”的人却寥若晨星，相当一部分人从事其他职业，只是业余爱好或“票友”，偶尔为之，并未走上文学之路，只是大半生与文学若即若离，属于业余守望者。我大概就属于这一类。

心系文学已经相当遥远，但少年时代并无什么像样的作品可以回忆。高中时即开始写诗，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内容大多为歌颂大好形势、步尘莺歌燕舞之类，偶尔写点少年理想壮志与迷茫苦闷之类，倒是经常受到语文老师表扬。记得当年临高考填报专业爱好一栏时，当时几乎没有多少考虑就豪情万丈地填写了“酷爱文学”四个字，以为以后就要走上文学之途，真如陆游所说“早岁哪知世事

艰”。现在想起来自己不觉莞尔，但也为当时的雄心壮志所感动，这大概是每一个文学少年都曾有的文学之梦。只是上大学后并没有被中文系录取，而是阴差阳错地进了历史系。尽管有所谓“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的民间说法，但我当时并没有沮丧，反而暗自欣然。自古文史不分家，冥冥中似乎预感到这辈子注定要与文史结下不解之缘。因而生平第一次离开家乡的那一天，多少有些踌躇满志，在欣慰与憧憬中登上了北去西安的列车……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白云苍狗，斗移星转，世事纷纭，几多成烟。回首如烟往事，大学寒窗苦读四年后，先干几年中教，又到地方师范学院任教，再负笈西蜀攻读博士研究生，于成都、重庆再就业。生活空间自汉中而西安，再从汉中而成都，从成都而重庆。自己的身份也在不断地变换，从助教到讲师，从讲师到副教授，从副教授到教授，再到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负责人，每年要承担从本科生到硕士生再到博士生的大量授课任务，身兼本地与全国学术机构的多项学术头衔，负责的省级、部级、国家级研究课题也接踵而来……几十年不间断地在职场忙，虽然也小有收获，出版了数部学术著作，发表论文近两百篇，在一定范围内也赢得一些虚名，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岁月无情地让我两鬓染霜。与文学之职业渐行渐远，再难企及，但与文学之梦始终没有完全绝缘。虽然对文学的“初恋”早已时过境迁，但一直心向往之，甚至有时还有不自量力的冲动，希望有一天能够重操早年一直跃跃欲试的长篇历史小说之“旧业”……

我们 20 世纪 60 年代初生的人，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同样

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雨历程，特别是内心情感经历的跌宕起伏、奋进与失落、激情与消沉、收获与挫折、苍凉与坚强、自觉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及至今并没有完全泯灭的理想主义精神，大概在以后是很难复制的。童年少年岁月是在那个动荡年代的乡村度过的，虽然很小就辗转陕南乡村，过早经历人情冷暖，尝尽世态炎凉，但也收获了不可再得的基层乡村社会人生体验，其中不乏收获苦难、饥饿中的真情与美丽。当年那些曾经的艰辛与苦难，积淀下来的大多是一种苦难中见真情的苍凉之美。结束乡村生活回到城市读中学，正是波谲云诡的三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带给那一代青年人枯木逢春的希望。四年大学岁月，除了有一年沉潜于写小说、诗歌与剧本，其他时间基本上是在夜以继日地读史籍文献中度过。当时写过一些自由诗与仿古诗，至今大多散佚，实际上也无多少价值。倒是曾经花费很大心血创作过一部冠名为《残阳如血》的历史题材电影文学剧本，并且承蒙母校中文系一位教授的青睞推荐到西安电影制片厂。虽然最终未能拍摄，但那时的激情与执着倒是让人颇为怀念。

大学毕业后的20世纪80年代，我在陕南汉中一所中学任教，不久后调入本地一所师范学院做助教。正值人生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青春时期，事业的奋斗、去与留的困惑、爱与被爱的纠葛，闪现心头的常常是哈姆雷特式的焦虑与矛盾。此时文学界伤痕文学渐渐退潮，寻根文学正盛，特别是朦胧诗异军突起，“美丽的忧伤”成为那一时期流行的诗歌美学追求，对80年代青年一代颇有感召力。因此，我一度沉迷于诗歌，1986年在汉中与几个文学青年自行创办过一个颇为新潮的诗刊《太阳与人》，据说曾成为陕南不少青年文学

爱好者的手抄本。这一时期留下的一些诗歌残篇，依稀还能反映当时的心态。

岁月荏苒，不觉又过去好多年。别梦依稀在，大江日夜流。时间总是在履行宇宙间无情的法则，几十个春秋似乎一瞬间就走远了，将一代艰难守望者带入了人生之秋。韶华不再，远山如黛，近水如斯，虽然这辈子并没有走上文学职业之路，而是在另一史学领域摸爬滚打数十年，但多年来的文学爱好与“修养”同样令我受益无穷，给我的教学与研究以莫大的“助力”。特别是第二副业“历史美学”常常带给自己特殊的愉悦感，激励自己去做无怨无悔的、枯燥的“冷板凳”学问，而且上课、演讲总是能够获得众多学生喜爱和好评，这无疑给我带来一年又一年“教书育人”的信心与快乐，由此我更能深刻领悟“文史会通”的妙处。临近“桑榆”之年，自己渐渐变得喜欢忆旧，有时居然觉得过去的岁月有那么多真善美的东西值得追忆、值得眷恋！回忆真是个奇怪的东西，无论是饥饿孤独的童年、颠沛流离的少年，还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读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执教席的青年，抑或是生活渐趋稳定却倍感苍凉的中年，当你真正超越时间回首往事的时候，留在记忆中的往往都是那些过滤掉无数平庸、伤感、烦躁甚至悲哀的灰色前尘，经过自然筛选而长存记忆的美好与感恩，没有仇恨，没有怨望，没有戾气，几多遗憾也随风吹雨打而去，俯仰无愧天地，坦诚笑对人生。在一定程度上讲，苦难岁月也是人生的财富，不应漠视，更不必要让其在记忆中完全湮没。你走过的人生之途无论坎坷还是平顺，都是宝贵的人生财富，永远不能忘记曾经的真诚付出与真诚赠予。

唐人刘梦得诗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辈不才，没有“为霞尚满天”的辉煌，却有与国家风雨同行的艰辛与欣慰。前几年偶然草写的一篇历史文化散文居然得到朋友圈好评，大家纷纷建议可在业余时间继续写下去，这无疑是一种激励。于是，一旦有了感觉，就开始忙中偷闲草写一些文史随笔，居然也陆陆续续地“产出”了一二十篇随笔、散文。在几家微信平台推出后，反响之热烈出乎意料。

这部散文随笔就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历史文化散文随笔，自己认为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走进巴山夜雨》《致敬古典》《布衣伟人——怀念卢作孚》《吴宓：最后的背影》《褒谷口之祭》《寻访仙人关》《秋风江上》《名门之后》《大唐：动乱年代的普通士庶》《跌宕的意象：唐宋诗中的关中与秦岭》等文化散文。这些散文或是在读史研史中的感悟，或是崇敬古典、怀念先贤之作，或者是在历史地理田野考察中触景生情。另一类则是个人经历中的回忆碎片，其中主要是童年与大学时代的一些人生片断。虽然多为凡人拾贝，但完全遵从纪实原则，从个人经历角度折射了我们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带有自述的“口述史”性质。上述或许就是这部散文随笔的价值所在吧。

近年来承蒙朋友们厚爱，大家都建议我将这些散文随笔结集出版。但对出版诗文集子我一直很踌躇。一是文学创作毕竟只是业余为之；二是积累的篇章多已佚失，余下的满意者不多，因此又放置了很久。但想想自己的文学之梦始终未曾真正放弃，寻寻觅觅、若即若离相伴四十载，也应该有个集子作为一个阶段性的纪念。于是，

在春节期间将能够找到的若干篇什重新阅读、修订，几经取舍，终于选定入选的文章，形成一部以历史文化思考为主，兼及人生回忆的散文随笔文集。原稿中本来还有若干诗歌（都是历经多年而幸运地保存下来的“精品”），但考虑到新旧诗体兼有，诗文混合，与散文随笔混在一起有些不伦不类，因而这次就忍痛割爱了，俟日后有机会再单独结集出版。

感谢西南交大出版社资深编辑黄庆斌先生，自几年前在达州巴文化学术研讨会结识以来，他就一直对我关注、鼓励有加，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部散文随笔的结集与出版。本书的责任编辑郭发仔先生为拙著原稿校核文字，付出了大量心血，纠正了不少错误，在此特表谢忱。同时也感谢多年来一直关心、帮助我的同道师友及其家人。时正炎夏，金秋即将来临，就以此小书作为金色秋天里献给自己、也献给师友亲朋的一份吉祥小礼物罢。

是为序。

马强

2020年7月31日于西南大学荟文楼





## CONTENTS

001 | 走进巴山夜雨

010 | 致敬古典

017 | 布衣伟人

——纪念卢作孚先生

024 | 吴宓，最后的背影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 寻访仙人关

——赴徽县参加吴玠吴玘暨仙人关战役研讨会侧记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 褒谷口之祭

——纪念褒谷石门石刻淹没五十周年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 永远的嘉陵江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秋风江上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 蜀人捕猴杂感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 巴人与战争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 地理意象的跌宕：唐宋诗中的关中与秦岭

错误!未定义书签。 | 唐风宋韵中的巴蜀

错误!未定义书签。 | 名门之后

错误!未定义书签。 | 苏东坡的地理情怀

**错误未定义书签。** | 陆游：奔走在巴山蜀水间

**错误未定义书签。** | 诗魂长留巴蜀间

——苏轼、陆游两代诗人的巴蜀地理情结

**错误未定义书签。** | 东坡故里纪行

**错误未定义书签。** | 大唐动乱年代的士庶命运

——读唐人墓志札记

**错误未定义书签。** | 行吟于绝壁栈云之上

——汇编元明时期的蜀道诗随感

**错误未定义书签。** | 渭水河边的童谣

**错误未定义书签。** | 遥远的村小岁月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田坝中的小学

**错误未定义书签。** | 1974，难忘的村中一年

**错误未定义书签。** | 外 爷

**错误未定义书签。** | 转学汉中

**错误未定义书签。** | 最后的高中时代

——纪念参加高考四十周年

**错误未定义书签。** | 在赴西安的列车上

**错误未定义书签。** | 初至西安

**错误未定义书签。** | 走进我的大学

**错误未定义书签。** | 寻梦文学

**错误未定义书签。** | 参加“西安事变”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秦岭边的古刹一夜

- 错误!未定义书签。** | 初为人师：我的三年“青椒”岁月
- 错误!未定义书签。** | 《太阳与人》：一段文学青年的往事
- 错误!未定义书签。** | 追忆：大学时代的老师们
- 错误!未定义书签。** | 《勘探队员之歌》：跨越时空的眷恋



## 走进巴山夜雨

---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

001

第一次读到李商隐这首《夜雨寄北》，是童年时在陕南乡下祖母家布满灰尘的小土楼上。那时，在地委工作的父母无暇照顾孩子，于是我从城固乡下外婆家被转送到勉县乡下祖母家。一天放学后无聊，出于好奇，就爬上祖母家布满灰尘的小阁楼，竟翻出一大堆旧报纸包裹的各种文学名著，其中就有一本散发出书香与霉潮味的《唐诗选》。此书由马茂元选编，于20世纪50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黑黄粗糙的那种马兰纸，但文字印刷还是清楚的。在那个时代，《唐诗选》属于“毒草”，被列为禁书。包括其他一些中外文学名著，都不能公开阅读。阁楼上还有一些诸如《三国演义》《儒林外史》《林海雪原》之类的书，应该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匆匆送

回老家乡下藏起来的书。那时没有什么可读的儿童读物，因此当时拿起竖排繁体字的《唐诗选》，尽管许多字不认识，需要连猜带蒙，竟然也读得津津有味。说来也巧，当时随手一翻，首先接触到的正是这首“巴山夜雨”。读起来虽然懵懵懂懂，但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美。

20世纪70年代末，我有幸考上了大学。当时“伤痕文艺”流行，相关主题的电影纷纷问世。记得一次陕西师范大学放映露天电影，放的是一部当时颇受好评的《巴山夜雨》，好像是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舍友们还为电影的取名争论过。影片演的是从重庆至宜昌的长江轮船上，一对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男女革命干部押解“犯人”——著名老诗人秋石赴京，押解者由冷漠监视、中途困惑最后被感化并毅然释放“犯人”的故事，据说是以四川老诗人流沙河的亲身经历为原型编剧、拍摄的。生于1931年的流沙河曾参与创办《星星》诗刊，经常写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讴歌新中国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但1957年他充满自由奔放之美的《草木篇》意外地受到严厉批判。在劳改农场，诗人竟然收获了省歌舞团美丽演员何洁的爱情。电影《巴山夜雨》没有正面描写这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画面虽然有些压抑，但诗人秋石在轮船上忧郁的目光与沉默的面容，分明包含着对妻子的深深怀念，而“巴山夜雨”这一独特的唐诗意境或许就是这部电影取名的“画外音”吧。

李商隐这首《夜雨寄北》以其别具一格的写作手法和美丽凄迷的意象成为诗人的代表作之一，自晚唐问世以来就广为传诵。看似不经意间灵感撞击出来的音符，拨动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关于这首诗的写作地点，宋代以来唐诗研究学者一直众说纷纭，分别有

写于长安、利州、梓州、兴元等说法，并无定论。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说，弄清写作地点固然有意义，但更需要揭示的是其写作成因及其美学意蕴。在南宋洪迈编的《万首唐人绝句》里，这首诗的题目为《夜雨寄内》，意思是诗是寄给远方妻子的。但一般认为，李商隐于大中五年（公元 851 年）七月赴东川节度使柳仲郢梓州幕府，妻子王氏已在这一年的夏秋之交病故，李商隐何时知悉妻子的死讯不得而知。王仲荦、陈寅恪等考证这首诗作于王氏病故之后，原题应是《夜雨寄北》，到底是写给妻子还是情人？甚至还有学者推测说可能是赠答与李商隐同时并齐名的花间派代表诗人温庭筠的，不过后一说只是极少数的“干扰项”，响应者寥寥，可以忽略不计。如此，“寄北”的对象竟成了历史之谜。今天看来，这首诗题原创是《夜雨寄北》还是《夜雨寄内》，是写于巴蜀的梓州还是利州，是寄给妻子还是写给情人，实际上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以巴蜀地区特有的“夜雨”气候物象为衬托，写出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深沉含蓄的爱情美学，以及作者在“巴山”浓密夜雨声中营造的温柔凄迷、时空幻化的意境。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走进过这巴山夜雨，多少人深深陶醉在唐代那个温柔的秋夜，陶醉在浓密的雨声中再走也不出来……

也许是从小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我向来推崇、赞美中国古代的爱情表达方式。中国古代爱情诗歌，无论是思慕、暗恋还是闺怨、思妇、悼亡、怀旧，往往都写得含蓄、执着、深沉、绚丽。从举案齐眉的相敬如宾，到为妻画眉的情投意合，从“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坚贞不渝，到“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

难忘”那样历久弥新的铭心刻骨，都把男女之间基于性爱而又超越性爱的深沉爱情发展到极致，爱情诗的真善美也就不言而喻。

品读《夜雨寄北》，眼前常常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用电影蒙太奇手法才能表现的情景：同一个夤夜，间隔着绵延千里的秦岭、大巴山的夜幕，独在蜀地异乡的诗人在梓州东川节度府庭院廊庑下徘徊，潇潇秋雨无边无际地飘洒着，四周一片雨声。庭院中的树木（或许是蜀地人家最喜欢种植的石榴树）枝繁叶茂，静静地沉浸在秋雨之中。此时的巴山夜雨多么像情人绵绵无尽的思念，温柔而缠绵。借着窗口昏暗的烛光，院中的石雕蓄水池溅起密密水花，雨水渐渐渐满，溢出来又流向池外；庭院积水很深，成了池塘，雨点编织出一片空濛与迷离景象。爱人今在何方？今夜无恙乎？诗人的思绪飞越秦岭，飞越大巴山，飞越关中平原，飞到了长安。啊，长安，大唐帝国的京师，无数士人心目中的繁华帝都，今夜却只为一人的存在。当年李白笔下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那是宁静美妙的长安月夜图，今夜却成了老杜笔下“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另一番景致。此时，长安城内某坊内小楼上，应该有一位美丽而憔悴的女子，披红倚窗而立，玉指托腮，向西南远眺，她透过密集的夜雨眺望远方那位让自己魂牵梦绕的“良人”。长安城此时已经完全静谧下来，无论是森严的皇城、宫城，还是棋盘菜畦般整齐的坊里，都已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与繁华，静静地入睡了。绵绵秋雨在天地之间淅淅沥沥，弹奏着长安秋夜曲，除了九街通衢上巡逻的禁军走过偶尔留下几声喝令外，只有这位丽人今夜无眠，在没有约定的约定中心有灵犀，为远方的“良人”暗暗祈祷祝福。她相信那个让她牵挂



的男人也在思念着她。但关山万重，蜀道难越，只有暗自期盼相会的日子早点到来。女子的凤眼明眸略含泪花，略带潮湿的夜风轻轻地拂过她的如云秀发以及包裹着苗条身材的绣衣。她期盼与情人相依于西窗之下，憧憬在夜深人静之时与爱人倾诉衷肠。说不完的相思，道不完的依恋，哪怕红烛已短，曙鸡已闻……然而，“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佳期如梦，彩云难归，美好的期盼毕竟只是幻想。今夜，有情人只能分别在千里之遥的秦岭、巴山南北，一个凭栏北顾，思念如绵绵秋雨；一个倚窗南眺，望穿秋水，与潇潇夜雨相伴。隔千里夜空对话，在梦中相拥剪烛，夫唱妻随，唱和这眷恋千年、感动无数人的绝唱。这就是唐人的爱情，这就是最具情感美学的古典爱之梦。

中国古代的爱情诗，表现出相当明显的性别角色不平衡性。诗歌的写作主体大致以女性角色与口吻为主，而抒情对象则以男性居多。这似乎与男性大多在外征战、入幕、科举、游历，而女子则总是在家纺织、教子、赡养老人的分工不同相关。因此，夜深人静、独守空房时，惦念、盼望丈夫早日归来团圆合欢，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古代女性的情感表达方式总体而言是含蓄、温婉、羞涩的，这从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和汉代乐府诗中大量爱情诗歌中可得到证实。中国文学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现象是许多“思妇”“闺怨”诗实则出自男性之手，所谓替女子“代拟”，竟然同样写得细腻委婉，如泣如诉，悲伤感人。有意思的是，还有一部分“妇怨”诗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每朝每代总有一些士大夫以“思妇”“臣妾”自喻，曲折表达自己怀才不遇，一片忠心无从送达，以求皇上

赐恩重用，这已经不属于爱情诗歌要讨论的范畴了。《夜雨寄北》的作者李商隐无疑是一个感情丰富深沉、性格温柔，有浓厚书卷气，怜悯关爱女性的男人。尽管仕途颇为坎坷多难，尽管因婚娶不幸卷入了“牛李党争”的上层斗争而饱受非议，被折腾得几乎走投无路，但在感情生活与文学创作上却丰收满满，不仅两任妻子皆出身簪缨高门之家，美丽多情，爱之忠贞不渝，而且他也因此成为描写男女细腻微妙感情生活的第一高手。发轫于李商隐的晚唐“无题”诗，缠绵悱恻，耐人寻味，意境甚美却难得其解，在中国文学史上别树一帜，其流风余韵甚至一直影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舒婷、北岛这一代诗人。晚清俞陛云（俞樾之孙，当代红学家俞平伯之父）在《诗境浅说》里点评《夜雨寄北》说：“清空如话，一气循环，绝句中最为擅胜。诗本寄友，如闻娓娓清谈，深情弥见。”而乾隆年间诗人桂馥对《夜雨寄北》的评价则更是入木三分：“眼前景反作后日怀想，此意更深。”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章回小说大家”的张恨水也写过一部叫作《巴山夜雨》的长篇小说，通过主人公李南泉一家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命运跌宕变迁，展现了一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川东乡村贫穷、苦难的生活画卷。比起这位蝴蝶鸳鸯派大师诸多言情小说来，这部小说并非名著，至今鲜有人知，但作家既然给小说冠名以《巴山夜雨》，也足见张恨水对义山诗的喜爱。台湾文学史家赵萱女士看重此书，称该书是张恨水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中的巅峰之作。这虽然为一家之言，但也包含对其书名的认可。而从诗歌语言艺术等方面探讨《夜雨寄北》的论文，仅仅从“知网”上检索，自1986年迄今就多达百篇以上，这都说明李商隐《夜雨寄北》

这首七绝诗的无穷魅力及其对不同时代的绵延影响。

当年初读这首诗时觉得很特别，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妙，但也曾对这首短短四句七绝诗为什么会两次出现“巴山夜雨”而感到困惑，须知古人在同一首诗中一般是会避免同一字词重复的，难道擅长诗赋、精通格律的诗人李商隐不懂这一常识吗？后来才意识到问题可能并非如此简单。短短四句诗，两次出现同一词组，一再突出“巴山夜雨”的意象，必然有作者独特的感受与特殊的寄托，或许是对某个美丽女子，对晚唐某一个秋夜特别难以忘怀吧。只是“巴山夜雨”这一美丽温润的意象在后世的文学史上多次出现，用以表达转意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心灵诉求，这大概是诗人始料不及的。

而对于我来说，或许是冥冥中命运注定，我半生的求学、执教之地竟然均与这首诗所涉地域相关。故乡地处秦岭大巴山之间，嘉陵江从汉中西北边缘蜿蜒流过，进入四川广元后南下，经过阆中、南充、合川、北碚至重庆朝天门，最后汇入长江。汉江南岸的南郑地近巴山，山民多操浓重川音，风俗、气候、物产更与四川无异，说自己是个巴山人也庶几可通。无论是读博士时负笈于西蜀，还是后来谋生执教于重庆，参加最多的学术活动是有关巴蜀的学术会议。前年，地处达州的四川文理学院聘我为巴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及《巴文化研究》学术辑刊编委，曾经在领导陪同下专程去城北凤凰山拜谒元稹纪念馆，表达对这位贬谪巴地通州诗人的崇敬。当晚给该校师生所作的学术报告题目是《秦巴山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开发》，近十年来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分别是有关嘉陵江流域与蜀道文献的课题，也不知道还需要多少次深入秦岭、大巴山地实地

考察，可以说多年以来一直与大巴山有难解难分的命运之缘。十几年前来到地处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执教，很快发现这里的“夜雨”气候现象非常明显，经常晚上入睡前会无意间听到窗外雨落树叶簌簌声，若有若无，时疏时紧，如春蚕食叶，如平沙落雁，如呢喃絮语，绝不喧哗，绝不张扬，却每每不期而至，恰好是那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美妙。于是，一天的紧张与艰辛也就随之而去，伴随着这奇妙的“巴山夜雨”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学校所在地北碚不远处嘉陵江畔有一座闻名遐迩的缙云山，山上植被茂密，古树参天，佛寺与道观并存，春秋两季常常云蒸雾罩，加上空气新鲜，山深林幽，成为远近有名的旅游胜地。北碚古代属于巴县地界，因而缙云山在古代舆地文献中也曾经被称为“巴山”。当地电视台不作深究，把《夜雨寄北》“移植”到了北碚，竟说唐朝李商隐这首名篇写的就是缙云山。每晚电视节目结束前还不忘配上不知哪个画家画的“巴山夜雨图”，再以美术字幕打出《夜雨寄北》诗作为“道别语”。业内人一看便知是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牵强附会，不知他们有何依据，也不知这一说法始于何人、何时。我初来北碚就发现这一问题，几次想致电电视台纠正，最后都苦笑着作罢。毕竟电视节目并非严谨的学术考证，况且他们这样做想表达的非是一种人文情怀，一种借名人名诗提高本土知名度的良苦希冀，何必非要义正辞严地去纠正呢。

往事越千年，现代化使得我们与古典时代、古典情愫愈加遥远，甚至令人产生一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悲哀。如今国人精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者可谓寥若晨星，大学师生在古典文学和艺术

修养方面与晚清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也无法同日而语。而承载着中国古代爱情诗最高美学意境的《夜雨寄北》，虽然现在仍然被各种唐诗选本选入，但毋庸置疑，真正的欣赏者或者说被感化者很少。今天，有多少青年人谈恋爱时会去真正体悟这首诗的情感表达与爱情美学？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只是被少数教授、学者津津乐道，仅仅是象牙塔里被研究的学问，而渐渐疏离于广大社会人士，这难道不应该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与反思吗？更严重的是，如果普罗大众与古典的精神和文化彻底割裂、隔绝，那么产生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文学危机了。

复兴中华文化不是一句空话，真正的“复兴”首先应该唤起国人的的人文情怀。二十几年前，我曾在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题目为《留下一点古典》，呼吁人们像保护大熊猫、朱鹮一样在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留住一些传统的美好东西，包括有形的物质遗产与无形的精神遗产。让人不无悲哀的是，“去古典化”在有些人那里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

或许，多少年以后，我们这一时代也变成了“古典”，那么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又会是什么呢？

（2019年9月16日于北碚雨夜）

## 致敬古典

---

读唐诗宋词，每每听古曲《高山流水》《阳关三叠》，都为之感动与陶醉，有时甚至会情不自禁流下热泪。不仅感动于古人那些工丽绝佳的诗句，更为其圣洁而醇美的意境与深厚的友情所深深吸引。这时，你会不知不觉地渐入早已远去的古典意境，去领略那个遥远年代曾经的繁华与美好。不过，毕竟那是古典的世界，曲终静思，回到现实真境，总有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淡淡的忧伤。在今天这个被流光溢彩的市场喧嚣和钢筋水泥城市包围的时代，还会有多少人去领略去眷顾那份古典的情愫呢？

然而，古典之于我们，始终是一份牵挂、一份眷恋、一炷心香，正如每一个人回忆自己的童年总会油然涌上几份温馨与怀念一样。且不说古典时代那些伟人圣贤的政治智慧与伟大的哲学思想，就是那些古典时代迎来送往、悲欢离合的日常人情，岁时节庆的生活景致，甚至古典时代的小桥流水、春江月夜、乡间炊烟也足以使人留恋。那些蕴含在古代诗词、笔记、小说里的友情、爱情、亲情，有时会让人神往，也会让人禁不住发思古之幽情。“桂棹兮兰桨，击空

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当年东坡先生在赤壁那个绝妙月夜发出的浩叹，抒发的岂是个人的惆怅，分明唱出了人们对历史、对美好企盼的心声。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正是我们对已经逝去岁月中那些美好事物与精神的应有态度。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梦回大唐，在遥远而漫长的丝路馆驿里，驿外黄沙漫漫，驿途迢迢，王维手中缓缓举起的那杯酒，却慰藉过许多征人的别离和相思。也许有了友人的这杯无价的酒，才会有“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样丝绸之路上盛大情景的写意。每次读王维此诗，仿佛总能看见这位诗与画兼长的大唐天才诗人幽默而真诚的微笑，及其送友人远行而去的忧郁目光。迢迢人生旅途，漫漫生存求进生涯，充斥着多少艰辛与险恶！唯愿友人一路平安，归来再举樽邀约，对酒歌吟，长话别离，这才是男人之间的真诚友情，才是看似平淡实则真切的情谊！从《送元二使安西》到几十年前那部《戴手铐的旅客》电影中难忘的歌曲《驼铃》，我们依然能够品味到这古典之酒的醇香，依然让人为之温馨与坚定：“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夜半北风寒，一路多保重。”有了志同道合的战友这样的叮嘱与馈赠，即使在再遥远的征程中、再荒凉的大漠中也不会感到寂寞与孤单。有如寒冬暖阳高悬，有如美酒在肚，虽然朔风凛冽，心中却是暖暖的。

男人之间并非全都是同性相斥和围绕权力的明争暗斗。翻开中国古代诗歌长卷，士大夫之间的友情酬唱比比皆是，其中不乏充满真挚关怀的佳话。比如李白与杜甫，比如白居易与元稹，比如柳宗

元与刘禹锡，比如韩愈与欧阳瞻，一直到清代的纳兰容若、顾梁汾与吴汉槎，他们之间至真至诚甚至生死相依的友情佳话至今仍然让人为之动容。

友谊是温馨的，然而又必须是平等的。只有各有才学、各有特色、各有建树，相互之间才会相互推崇、互为知音。试想，李与杜、元与白、柳与刘，谁不是才高八斗、各领风骚呢？对于唐代诗人而言，在险恶复杂、明枪暗箭防不胜防的官场中，大多数诗人始则竭力跻身其中，中则迷惑困顿，终则捂着累累伤痕黯然逃出，只有从诗人同行间的关怀、鼓励中才能获得慰藉。否则，怎么会有李白流放夜郎让杜甫忧心如焚，甚至喊出了“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样不无极端的惊人之语，情真意切，惊世骇俗。实际上自从天宝四年在兖州分别后，李、杜二人已经有十五年未见面了。此时杜甫流寓成都，惊悉李白因永王李璘事件受到牵连，被朝廷流放夜郎，甚为关切，因焦虑而作诗怀念。而白居易与元稹，则是生死之交。白居易被贬偏远湿蒸的江州寓所（今江西九江），元稹寄诗关怀；元稹被贬巴南烟瘴之地通州，白居易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关怀，甚至两人心心相印到同一夜作同一梦。元稹赴东川公差，老白度日如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同样，白居易与同僚游大慈恩寺与曲江，同一天远在梁州（今陕西汉中）的元稹居然晚上梦见他们：“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所惊身在古梁州。”两个男人的友谊到了这一地步，谁也无法否定。宋代欧阳修曾作《朋党论》，强调交朋结友的原则，真正的朋友应该以“义”为



重，即志同道合，道路合者方相为谋，方可为友。

祖国的古典音乐是世界音乐史上的瑰宝，有其独特的风格与永恒的魅力。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秋天，我从汉中去西安上大学，整整一夜都站立在挤得水泄不通的绿皮火车上，列车大部分时间在秦岭隧道和嘉陵江峡谷里穿行，车窗外黑黝黝一片，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车厢内则拥挤、闷热，旅程的艰难现在已经很难再去想象。天亮时列车快到咸阳了，我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人群中，头晕脑胀，几乎难以坚持。这时，列车上突然一首音乐响起，宛如仙乐，让我疲惫顿消。凝神静听，乐曲是那么美妙、那么动听，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只是不知什么曲名。也恰好在这个时候，终于有了座位，尽管快要到达终点，我仍然感到十分幸运。坐在旁边的一位两鬓霜染的老人喃喃自语：啊，《渔舟唱晚》好多年没有听过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琵琶弹奏曲《渔舟唱晚》，从此竟执着地喜欢上了中国古典名曲。大学毕业后有了工资收入，我陆续购买了《阳关三叠》《梅花三弄》《夕阳箫鼓》《汉宫秋月》《阳春白雪》《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广陵散》《平沙落雁》等磁带。以后每当身心疲惫或者遇到挫折心情沮丧的时候，我便打开录音机静静地听上一曲古乐，阴郁的心境就会因之云开雾散，一切世俗烦恼也就渐渐淡化，悄然随风而去了……去年春天在海南大学参加苏东坡研讨会，会议宴会间安排文艺表演。一位表演琵琶演奏的女士，据说是一位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退休教师，穿着汉服，婀娜多姿，微笑颌首后坐下来，双手似乎随意弹了两下，一段美妙的古典旋律即飘逸而出，似如暗香浮动，美妙的旋律弥漫在大厅，与会代表无不肃然

起敬。这情景不正是白香山先生“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的意境再现吗？长达五分钟的《渔舟唱晚》演奏，大厅静谧肃穆，听众似乎都被深深感染，沉浸在古典音乐无穷的美妙之中……

古典艺术的魅力还表现在传统书法上。中国古代书法是古代文化与艺术审美的高度结合，是难以超越的丰碑，因为它的风骨、形体、神韵都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人要想写好字，必须从模仿、师承古人的帖子开始。我自己也曾经多次面对王羲之的《兰亭序》发呆、入迷，尽管今天看到的只是大量复制的临摹本；也曾经多少次临摹甚至影格涂描，却终难达到神似。唐代真是书法家们大展身手的时代，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大唐帝国时代的书法大行其道且大多流传后世。唐人善书法固然与科举取士以及唐太宗、武则天等皇帝的嗜好有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但更多的还是一种时代风尚。唐人重墨翰，喜书法，唐代书法名家辈出，促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鼎盛。在唐朝，选官重“书判”，即要考察你的字写得如何。如果某人诗赋与策论都不错，但字的书写蹩脚，那么对不起，照样让你出局。但我更愿意相信，那么多潇洒飘扬、各领风骚的书法，或大气磅礴、剑拔弩张如柳公权，或雍容华贵、正义庄严如颜真卿，还有汪洋恣肆、酣畅淋漓的草书如怀素，不正是大唐帝国任侠豪迈、扬眉吐气的时代韵律在书法风格上的折射吗？在一大批古代令人肃然起敬的书法家中，我最敬仰的还是宋代百科全书式的大家苏东坡了。东坡先生的魅力首先是其人格的卓越高尚、性情的旷达超脱，当然还有其“全才”的亘古罕见。书如

其人，书法折射出的同样是一个人的内涵、修养甚至气质、意志、性格。因为东坡先生伟大的人格与巨大的文化成就，人们对他的书法之关注与喜爱自然顺理成章。当然他的书法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其勤学苦练的结果。他曾经幽默地说：“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虽言古人，何尝不是自我“功夫”的写照？苏东坡的书法特点在于酣畅笔墨中追求天真平淡与古拙，不刻意雕琢，不计较点画位置，不在乎肥瘦得失，情之所至，笔墨赋形。他说：“短长肥瘠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苏轼的书法点画肥厚、气韵连贯、任情率意，极富笔墨情趣，书卷之气充盈其间，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幸运的是，今天我们依然能够近距离地欣赏他的不朽作品《黄州寒食诗帖》《归去来兮辞》《新岁展庆帖》《前赤壁赋》之真迹。关于东坡的书法之美妙，还是其终生的崇拜者、苏门四学士之一的书法名家黄庭坚说得到位：“东坡书如华岳三峰，卓立参昂，虽造物之锤炼，不自知其妙也。”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典美是永恒的，也是相对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曾经熟悉的古代会更加遥远，现代也会成为渐渐老去的古代，就像一簇美丽的星云愈飘愈远。然而，并非所有昔日的事物都美好无瑕，都能被称为“古典”，正如一个时代结束，只有极少数人会载入史册一样，绝大多数人会成为匆匆过客，很快化为尘埃，烟消云散于无形。只是大凡能够被称为古典的东西，总是经过了岁月的过滤与选择，淘汰了大量平庸与糟粕才遗留下来的精华，因而总有其特有的魅力。哪怕只是一首残诗，一片

破碎青花瓷，一两声夕阳渔舟唱晚的桨声欸乃，都会让你顿然脱俗，那是永远不可复制的美妙！只要你用心地去欣赏、去凝神思考，就会让我们在不无沉闷与平庸的日常中少些油腻，多点清新……

（2019年7月15日初稿，2020年4月修改于嘉陵江畔）

## 布衣伟人

### ——纪念卢作孚先生

---

来北碚执教十几年，在这个嘉陵江重镇时常能够感受到民国时期人物卢作孚的巨大影响。居住的小区后门外深巷对面有一游人稀少的山坡园林，平时大多时候被一个陈旧的铁栅门锁着，小园林里数十棵参天大树遮荫下是由几十间陈旧平房组成的院落，曾经做过多年的重庆自然博物馆。后来博物馆移址新建，这里就渐渐冷落下来。别小看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小园林，它还是抗战前后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旧址，曾经有不少后来成为新中国科技与学术骨干的民族精英与著名学者在这里奠基起步，开始了科学研究的航程，而其缔造者正是卢作孚先生。近年不断有研究民国与抗战史的学者、研究生前来探询、瞻仰。北碚区中心有一块树荫遮天、曲径通幽的休闲之处叫北碚公园，是北碚居民休闲的佳地，也为当年卢作孚所创建，至今仍然造福于一方。我所供职的西南大学分别有学术机构“卢作孚研究中心”与“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同样是为研究卢作孚而设立的。这一切都昭示着一个并不久远的历史人物与这座城市的关系。

我曾经多次端详卢作孚遗像而暗自思索，这位相貌儒雅，甚至看起来有些文弱的男人，是怎样的禀赋让他由一个合川小职员成长为一代民国历史的精英，是怎样的时代浪潮使他从一个小小江巴璧合四县峡防团务局局长一跃成为著名爱国实业家，在抗日战争中带领一家企业毅然担当起民族救亡与复兴的重任，并且奇迹般完成几乎不可能的宜昌大撤退？是什么强大的精神，让他具备如此悲天悯人的情怀？又是什么原因在他甫入中年、年富力强之时做出如此人生抉择，将自己曾经承载民族苦难的生命之船永远抛锚在那个寒冷的早春？

卢作孚离去已经近 70 年了，虽然历史的风帆将他那个时代愈推愈远，成为一团渐行渐远的模糊“星云”。但无论怎样时过境迁，真正的圣贤精神是永不过时的，因而今天愈发引人怀念。前几天重庆一家晚报编辑来电说，为配合在重庆纪念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三大中国乡村建设先驱的学术周活动，希望我能够写一篇纪念卢作孚的“非论文”性随笔，这让我难以平静，也让我犯难。说实话，我的专业并非民国抗战史，虽然对卢作孚的景仰无须多说，但要真实用笔再现这位伟大的民族实业家、教育家的一生，特别是要刻画他平凡而又伟大的形象，写出他最可贵的思想品质与精神风貌，并非易事。那应该是长篇历史传记作家或历史小说家的事，以一篇区区千字的散文来写这位曾经为中国乡村教育与抗日战争作出巨大贡献的前辈，真有些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犯难。可是，多年对卢先生的崇敬与感悟难以抑制，最终还是笨拙地动起笔来。

你可能很难想象，在 80 多年前中国偏僻的西南之地，在广大乡

村仍然沉睡在千年定式的“穷、陋、散、脏”蒙昧长夜的时候，这里竟然会诞生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贤者和智者，办学校、设报馆，修铁路、开煤矿，修博物馆、电影院，建平民公园与温泉浴场，而且大多免费向公众开放，甚至率先在全国创办民营科学院，招徕流亡的科学文化精英来此创业，直至把一个曾经土匪出没、民不聊生的偏远北碚打造一个迅速跨进现代文明、人文荟萃之地。

实际上何尝不是小小的北碚，近年来在国内多次举办的民国乡村建设、抗战大后方、民国教育等学术会议上，卢作孚的名字与事迹愈来愈多地被提到。历史毕竟不会遗忘对吾国吾民有杰出奉献的人，一个曾经伟大却始终以布衣形象出现的贤者，一个曾经在民族危难中舍生忘死殚力担当的民族企业家，一个正值人生盛年值万人景仰之际却在巨大时代变局中倏然消逝的民国星座。今天，卢作孚的意义已经超越一个民国抗战人物的特定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古老儒家圣贤文化在中国山河破碎、风雨如晦年代的一个符号。

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特有的局势与社会现状。同样，每个时代也会涌现出这个时代的民族精英与风云人物。20世纪前半期，我们古老的祖国先后经历了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其中的任何一次都是中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深刻地冲击着中国古老的社会结构和无数士庶家庭，卢作孚的悄然出现或许会为这一历史时期增添新的注解。

无论是对蕞尔之地的合川、北碚，抑或是对20世纪的中国，卢作孚的出现都是一个奇迹。卢作孚出身于小商贩之家庭，做过乡村

小学教师，这在当时是再平凡如常、平庸不过的普通人“出身”。他没有辉煌的先世与显赫家族，却有异乎常人的禀赋，幼年家境贫寒，辍学后自学成才。他甚至独自编著多本中小学教材，其中竟然有诸如《几何》《代数》这样的类似于西方儿童科学启蒙读物的教材。

卢作孚于国于民的贡献多不胜数，但最不能忘记的是被晏阳初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宜昌大撤退。中国的抗日战争史永远铭记这样的时刻，1938年10月至11月那刻不容缓、惊心动魄的宜昌大撤退，现在被学者比喻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二战中，英法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纯粹的军事撤退，尽管天空中有德国飞机轰炸，后有追兵迫近，但毕竟英法盟军还是荷枪实弹，保存着相当的实力。而当时中国的宜昌大撤退却只能有一种选择，这里积压的大量来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现代工业设备，是中国民族资本的家底。特别是从汉阳搬运而来的制造武器弹药的机床，那可是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最后的“物质基础”，更何况还有成千上万从东部流亡而来的难民，高贵贫贱，形形色色，全部困于这个不大的江城，等待入峡前往重庆。宜昌大撤退的情况相比于法国敦刻尔克，实际上更为复杂和令人焦虑。

1938年10月，武汉三镇已经失守，宜昌正处于严重拥塞、混乱之中。刘重来教授在《卢作孚与宜昌大撤退》一文中写道：“从上海、南京、南通、苏州、无锡、常州、武汉等地匆忙撤出来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各类人员、物资都拥塞在这里，宜昌沿长江两岸堆满了待运的机器设备。由于撤退仓促，不少机器设备来不及捆扎装箱，都敞露散乱堆在地上。而从全国各地逃难来到宜昌的难民，已达 3



万人之多，其中有不少科学家、艺术家、教师、工程师、医生、企业家及公务员等。一时间，宜昌成了荟萃全国知识界精英的‘人力库’。从各地逃难来的 1000 多名难童也滞留宜昌。当时的宜昌，只是个城区仅 2 平方公里的小城，一下涌来这么多人，所有的房屋都挤满了人，不少人只能露宿街头。”更何况还有日寇的飞机常常乌云般飞临，并狂轰滥炸，情景之危急我们不难想象。卢作孚硬是以超人的智慧和毅力力挽狂澜，奋战整整四十个日日夜夜，指挥完成了这场空前绝后的“宜昌大撤退”的任务。1943 年，卢作孚回忆这段难忘经历时仍然激动不已，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中写道：“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近年出品的央视大型历史人物纪录片《记忆——卢作孚的 1938》中说：“西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靠一个国家的力量、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来完成的；而中国的宜昌大撤退，是由一个实业家指挥完成的，在中外战争史上，只此一例。”这一比较性评价甚为精当。

1949 年 4 月，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此时的局势正如毛泽东所说，新中国如一轮朝阳即将“喷薄欲出”。而此时大量企业家、科学家、学者既憧憬，又忧虑，何去何从，实难选择。1949 年 6 月，本来已经率领船队至香港的卢作孚几经观望，在彷徨中接受了周恩来的邀请并毅然回到内地，怀着对新中国的热切期冀参加了北京的第一届政协会议，准备在新中国继续致力于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交通建设事业。他重新回到重庆，回到他当年起步创业的地方，重新经营

起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立下丰功伟绩的民生公司，满怀信心准备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卢作孚终于回来了，又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重庆。他意气风发，雄心勃勃，准备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再创辉煌。卢作孚带头把民生公司交给了国家，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

卢作孚作为一个从重庆乡村走向中国与世界的人，与那一时代许多“实业救国”者一样，心怀爱国赤诚之心，历经艰险，呕心沥血，经营有道，在经商事业上由几条小船发展成在长江上游拥有绝对优势的民生轮船公司，而且最终打破了外国轮船公司对长江营运的垄断。生逢乱世，却遇“乱”不乱，在捍卫民族命运的抗日战争中哪怕拼光家底，也要舍身为国，竭尽其能，终于坚持到了抗战的胜利。他创建的民生轮船公司及其经营理念，也为中国早期企业做出了表率。仅仅从这一意义来说，他足以名垂青史。经叔平先生评论说：“民生公司和民生精神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企业文化建设卓有成效的典范。”厉以宁教授更是认为：“卢作孚先生创立的民生公司，有理由被认定为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内企业文化建设卓有成效的一个范例。卢作孚先生是我国近代企业文化建设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卢作孚始终温和朴素，始终以一布衣的良知与谦和从容为人处事，从不张扬，其衣着与模样始终像一乡村教师般的朴素无华。至于卢作孚的性情与品质，其实后人无须再作考证钩沉，当年国民政府中央机关的“人事档案”说得已经十分真切：卢作孚“性情温和，精明干练，学识平常，品行尚佳，做事勇于负责”。这种近乎档案用

语式的评价看似朴实简略，却真实地记录了卢作孚的性格气质、能力才干、品行学识，特别是难能可贵的“担当”精神。正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使他走出了偏僻而闭塞的乡村，走向了实业救国的道路。走向了烽火连天的民族战场，走向了历史的永恒……

黄昏的风阵阵掠过温汤峡的谷口，碧波荡漾的嘉陵江依旧缓缓流过北碚这座著名的抗战之地。初夏的夕阳余晖给嘉陵江留下一抹略带古典的脉脉温情，一些穿着短衣短裤的少年在江边游嬉着，几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向远方指点着什么，处处呈现出一片安详闲适的景象。远处的缙云山上，万顷葱郁碧翠中狮子峰依旧凌空屹立，默默地俯瞰着脚下早已今非昔比的现代化北碚。那朴素而又突兀的狮子峰，多像伟岸而朴实无华的卢作孚先生。看到这些，不由得在心中默默吟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以范文正公《严先生祠堂记》中的名句敬献给卢先生，是再恰当不过的。

(2019年8月30日二稿修订)

## 吴宓，最后的背影

---

北碚冬日的风虽然不像北方关中平原那样寒冷凛冽，却依然有些寒气袭人。夕阳的余晖投射在西南大学文学院古色古香的砖木结构大楼上，不甘落寞的树木在静默中仿佛期待什么。曾经焚毁又重建的“雨僧楼”前两侧树木稀疏的花园旁边，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历史文化名人颇有些沧桑感的青铜雕像，一位手夹纸烟，器宇轩昂，翘腿傲然端坐，倒是把“横眉冷对”的气质雕塑得活灵活现，一望便知是鲁迅；另外一位则身穿中式长衫，满目恭谦甚至略带寒酸，夹一书卷默默站立，仿佛仍然在苦苦期待重新走上讲台，后者无疑就是吴宓了。

20 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吴宓虽然不是最为耀眼的星座，但也不是随便可以淡忘的流星。且不说他是中国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创者，是第一位用西方文艺理论研究《红楼梦》的开山学者，单就他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聘请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与陈寅恪四大导师入清华任教一事，就足见他身份地位与影响力了。吴宓跌宕起伏的人生、大智大慧却又若痴若愚的思想行为，可以说是中

国 20 世纪知识分子的缩影。

吴宓早年和鲁迅有过争论。鲁迅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史地位，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惊世骇俗的“匕首”小说《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等横空出世、奠定其文学地位相关，这位以反传统面貌横空出世实际上后来又回归传统的作家，他所编纂的《唐宋传奇集》《中国小说史略》足以证明其国学功底也非同寻常。有人说吴宓 20 世纪 20 年代在创办南京《学衡》杂志时，受到过鲁迅的批判，实际上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学衡》是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不久吴宓办的一个相对保守的刊物，吴、鲁二人一生并未有过交集，吴宓留学西洋，为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白璧德教授的得意门生，回国却参与创办了《学衡》杂志。为什么一个喝足洋墨水，接受了西方近现代哲学、文学思想的青年学者回国后反而成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呢？这一现象倒是值得深入探究。而其一生所受毁誉，也大都与主编《学衡》有关。实际上鲁迅对《学衡》这样的“逆流”小刊是不屑的，至于是否说过“批判”之类的话，则尚有争议。

迄今为止，吴宓仍然是西南大学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人文学者泰斗。如果从 1950 年算起到 1977 年为止，吴宓在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差不多度过了一生最后的 28 年。在这里，他曾经意气奋发，著书立说，设坛讲学。20 世纪 50 年代，因为形势不稳，知识分子经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吴宓虽然已经渐渐察觉到能够自由呼吸的日子愈来愈少，但毕竟还算有尊严地活着。特别是在绝大多数知名学者在劫难逃的反右斗争中，这位重庆数一数二的大牌教授，居然侥幸地逃脱了斗争，未能戴上右派

的帽子，让很多人迷惑不解、不甘，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我们从《吴宓日记》可以发现，在风声鹤唳的1957年，吴宓并没有犯读书人最容易冲动的错误，面对不断鼓动的“阳谋”一直保持着惊人的冷静与睿智，很少出门，也很少在开会时发言。无论领导怎样鼓动，他始终没有公开发表议论，因而部署者、构陷者包括幸灾乐祸者最终怏怏而去，无可奈何。

1977年春，中国逐渐解冻、走向春天复苏的时候，油尽灯枯的老人反而在这个时候步履蹒跚地离开了北碚，在乍暖还寒的初春萧瑟中告别了给他带来无数苦难回忆的文化新村“亭子间”，由妹妹吴须曼陪同回到桑梓之地陕西泾阳。那一天，偌大的重庆大概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一次从北碚、从西南师院离开的不是一个普通的老者，而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代巨擘——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历史上大概不可能再有的旷世大师！然而，这时的吴宓就像是校园冬天里被寒风随意驱逐的一枚枯黄落叶，无论漂泊到哪里都没有人关注，自然也没有人同情与挽留。更有甚者，有人还把老人多年的诗稿窃走不还，不知诗稿今天是否还在人间。也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怎样离开学校的，是否有人送行。所有这些我们只能从吴须曼的回忆中略窥一二。后来的学者看到这凄然的一幕可能会倍加遗憾，但对吴宓来说，后人的遗憾已经无济于事。离开栖身28年、带给他无数痛苦与迷惑的北碚西南师院，对他来说大概反而是一种遇到大赦般的侥幸与解脱。我也无法想象当这位世纪老人在孤寂的两天一夜，在从北碚驶往西安摇晃颠簸的绿皮火车硬座上是否流下过辛酸或者欣慰的泪水。

吴宓不仅在西南大学历史上是重量级前辈，而且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曲永难复制的悲歌。且不说他在 20 世纪前半期传奇的经历，他是旧中国时代士林的代表，曾经的他是那样风流倜傥、踌躇满志。在中国知识分子忧虑何去何从之际，吴宓却几经考虑选择留在大陆，并且毅然辞去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职务，溯江西上来到偏僻的重庆北碚，来到当时很不起眼的私立勉仁文学院与相辉文法学院任教。也许他觉得，既然北碚在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半国土的时候都是一片诗书人、科研人的净土，或许也可以安身度过余生。这样的想法确实也曾短时间如愿过，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十七年间，尽管吴宓过得愈来愈谨小慎微，但依然享受着不错的待遇。在西南师院，他是学校仅有的二级教授，一度早餐可以有牛奶、面包，可以执教西洋文学。甚至在 1961 年，还可以乘坐火车南下广州，去中山大学探望他一生最为崇敬的陈寅恪教授……

因为本人的专业方向的缘故，我对现代史上的人物留意不多，直至 1993 年才第一次听说吴宓的名字。那一年去西安参加会议，回归汉中时，咸阳方志办张世民先生托我带回借阅汉中师院的《吴宓诗集》并代为归还。这本发黄的民国商务版《吴宓诗集》恰好汉中师范学院图书馆有收藏。恕我孤陋寡闻，当时对吴宓几乎一无所知，翻了翻全是旧体诗，但其中夹杂着不少英、法外语词汇，使之与纯粹的“古典文献”相区别。几年后在陕西韩城参加司马行迁与《史记》研讨会期间，西安外语学院的黄世坦老师说起吴宓来十分激动，并且赠送我一本吴宓纪念文集，上面有不少都是当代学术大家如季

羨林、李赋宁等人充满深情与感恩的回忆。印象深刻的有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赋宁教授用英文写的回忆：“如果说我或者我们这一代与吴宓有点什么关系，至多也就是同为陕西人，其他则无法比拟。”余生也晚，无从面谒吴先生，更无由亲炙。不过冥冥之中有缘的是，在先生离开北碚近三十年之后，我也来到当年的西南师范学院即现在的西南大学执教。西南大学校园中建有宓园，但在旧式宿舍楼上，不专门寻找，很难知道在哪里。那一年我博士毕业一到“西师”，出于对这位文化巨人“老乡”的崇敬，就急忙寻访吴宓在学校的旧居和执教过的教学楼，曾在“雨僧楼”下久久徘徊，竭力想象晚年雨僧先生在“西师”的情景。

吴宓告别人世间已经整整 41 年，学校对他的纪念除了召开过几次研讨会、建过一个就地取材的“宓园”外，几乎没有什么纪念活动，他的故居一般人也很难找到。这位民国年间卓而不群的一代传奇士人，曾经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文化巨人，单凭他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山长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入座就已经足以列载史册，最后却在国人的记忆中渐行渐远，渐隐渐消，以至于当代青少年知之者甚少。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询问过学校的文科学生甚至“吴宓班”的学生是否知道吴雨僧？回答知道的甚少，大多是茫然摇头，甚至有个女孩子反问我：“您说的是不是古代的一个和尚？”她的天真与茫然让我更加茫然。从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角度考察，吴宓是最不应该被忘记的人物。吴宓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与命运遭际，实际上是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与写照。

当然，最让人唏嘘不已的还有他终生不能梦圆的爱情。当年风



流倜傥的他对风度优雅的毛彦文女士苦苦追求，而毛对他则没有感觉。据说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上海，毛彦文也曾一度有意接受吴宓的爱情，不料吴宓这一段时间却心不在焉，去了美国几个月，错过了最佳时机。结果机会稍纵即逝，也就再无机会。不过，从吴宓后半生漫长的几十年看，他的痴情是真诚而又辛酸凄楚的。

在重庆现代史上，20 世纪影响最大的两个历史人物不该被忘记，一个是卢作孚，另外一个无疑是吴宓，虽然他们都早已化入了历史的苍茫与永恒。曾与吴宓共事的百岁老人曹慕樊先生说过：“吴先生的声誉是大学的名教授，论其平生的爱好倾向，则是诗人。”此可谓知人之论。是的，纵观吴宓一生，虽然他生命中的大部分岁月是教授，但其生性率真，实为诗人，而诗人的命运大多都是悲剧性的。

